



价格理论与实践
Price: Theory & Practice
ISSN 1003-3971, CN 11-1010/F

《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 CGE 模型的模拟分析
作者： 程远，徐杰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6.01.003
网络首发日期： 2026-01-12
引用格式： 程远，徐杰. 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 CGE 模型的模拟分析 [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 <https://doi.org/10.19851/j.cnki.CN11-1010/F.2026.01.003>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 CGE 模型的模拟分析

程远 徐杰

内容提要：在当前我国价格水平持续低位运行的背景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调控的有效性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建立包含多种类型财政政策特征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降低直接税税率、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指标特别是总体及不同产业的价格水平的影响效果及机制进行模拟分析。本研究的模拟结果表明：首先，三类扩张性财政政策都提升了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价格水平的提升。其次，三类扩张性财政政策都促进了需求结构向消费倾斜。最后，三类财政政策对各产业价格水平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总体而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高，而农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财政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政策精准性以实现价格合理回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财政政策；价格水平；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6.01.003

中图分类号：F812.0；F726 文献标志码：A

一、研究问题提出

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成为扩大内需规模、稳定经济增长、促进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①，积极对冲外部不确定性，为经济稳定增长、持续向好提供支撑。当前价格水平低位运行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2024 年全年 CPI 涨幅仅为 0.2%，2025 年前 10 个月 CPI 比上年同期下跌 0.1%，2023 年 1 月至 2025 年 11 月，PPI 已连续 35 个月同比下降^②。并且截至 2025 年第二季度，GDP 平减指数已连续 9 个季度为负^③。价格水平长期低位运行的态势不仅制约了企业盈利空间与投资意愿，更削弱了居民消费信心与市场活力，那

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否有效调控价格水平、推动其向合理区间回升？这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影响宏观经济各部门价格水平的政策效果方面存在差异，不仅体现在各类财政政策在提升经济总需求的效果不同，更体现在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在调整支出和税收结构的渠道和强度差异上。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价格效应分析不应仅限于总量层面上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的分析，而应在国民经济循环的整体框架中，分析财政政策调整对物价水平产生的结构性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建立了包含多种类型财政政策特征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不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指标，特别是总体及不同产业价格水平的影响效果及机制进行模拟分析。具体而言，本文主

①资料来源：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5-12-11).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51211/a583f835702d4dc2b8990ddee4644e92/c.html.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价格指数(月度)，详见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③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25 年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点评[R/OL].(2025-07-16).https://www.cf40.org.cn/article/1/28916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金流量视角下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资金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构建及政策分析”(72204263)。

主要作者简介：程远(1987-)，男，汉族，河北邯郸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

要关注三类财政政策，分别为旨在扩大国内需求的减税政策、旨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化科技投入政策，以及旨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力度政策。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财政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政策精准性以实现价格合理回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二、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传统货币主义认为，价格水平由货币供给决定，财政仅在“赤字货币化”时通过货币侧面间接影响通胀(Fisher, 1911; Friedman, 1956)。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的研究逐步强调财政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作用。Sargent和Wallace(1981)的“不愉快的货币主义算术”最早将赤字融资与未来通胀联系起来：在财政主导情形下，货币当局即便当期收紧，也可能因未来被迫货币化赤字而加剧通胀的代际再分配问题。沿此脉络，Leeper(1991)提出“积极/消极”的货币—财政规则组合，指出只有当货币规则满足泰勒原则且财政端承诺以税收/支出对债务进行反馈时，价格水平才由货币规则锚定。进一步地，Sims(1994)将上述直觉形式化为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在非里卡多体制下，价格水平通过调整名义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来使政府预算约束成立。沿此脉络，Cochrane(2001)从资产定价与债务久期切入，强调名义负债、贴现因子与收益率曲线的共同决定作用。近有研究深化并拓展了该理论框架，在低利率环境下，Blanchard(2019)重新评估 $r < g$ 对债务可持续与通胀风险的含义，提示低利率并不等同于财政约束的消失，而Kaplan(2023)则在异质性代理人模型中量化了这种风险，指出即使在 $r < g$ 的条件下，持续的财政赤字也可能通过特定的财富分配渠道，削弱价格水平的确定性，从而在长期构成通胀威胁。同样，Kwicklis(2025)也利用HANK模型，分析“积极财政—被动货币”组合，发现对特定群体转移支付虽能刺激产出，但累计通胀水平主要取决于未偿付的政府债务总量。

在实证研究方面，早期实证研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Sargent(1982)以拉美为例，发现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Reinhart和Rogoff(2010)则通过历史数据发现，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时，通胀风险显著上升。Alesina和Perotti(1995)分析OECD国家指出，紧缩性财政调整若以削减支出为主，对价格水平影响较小；若以增税为主，则会压制需求、降低通胀。近年研究更多采用结构VAR与DSGE模型。Bianchi和Ilut(2017)利用美国数据指出，20世纪70年代曾存在财政主导阶段，

价格水平对财政赤字冲击反应显著。Cochrane(2020)则通过贝叶斯估计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赤字增加，但由于货币政策仍占主导，价格水平总体稳定。最新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机制，Cevik和Miryugin(2024)基于跨国大样本数据，采用局部投影方法分析财政冲击对通胀的动态响应，结果表明：扩张性财政冲击在中短期内都有显著的通胀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会受到财政空间和制度框架的调节。Barro和Bianchi(2023)基于37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构造跨期预算约束变量，发现政府支出扩张与通胀率显著正相关，这一关系在疫情后全球通胀背景下尤为明显，凸显财政因素在价格水平形成中的实证作用。

国内学者普遍关注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传导机制。董秀良和帅雯君(2013)基于FTPL框架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长期处于货币主导体制下，财政赤字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胡宗义与刘亦文(2011)运用SVAR模型分析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效应，指出财政支出冲击在短期内对CPI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减弱。王振霞和张昊(2025)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检验非预期冲击、财政政策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非预期冲击会通过财政政策传导影响价格水平，积极财政政策对物价具有显著的稳定作用。此外，也有学者引入一般均衡的框架，如樊勇和姜辛(2020)基于投入产出法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增值税对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并非由税率单一决定，而是受到税负转嫁能力和行业间技术关联的叠加作用。进一步地，有学者部分尝试引入非线性DSGE框架分析财政政策与宏观价格稳定之间的动态权衡，如付一婷等(2025)基于非线性模型刻画“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机制，揭示了宏观政策协调在抑制系统性风险中的作用，为理解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与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财政政策效果进行检验，而利用经济模拟方法对特定条件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的研究较少。少部分研究采用DSGE模型等总量经济模型，对总体层面上的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分析，但缺乏从系统性、结构性视角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果进行模拟分析。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当前实施的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特征纳入统一的CGE模型分析框架，并利用CGE模型刻画经济运行的整体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特点，通过量化模拟分析来讨论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财政政策的精准调控提供了具有直接参考价值的经验证据。

三、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影响的机理分析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财政政策通过调整政府支出规模与税收结构,对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产生系统性影响,并经过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多条渠道作用于价格水平。结合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以及本文模型的分析框架,本文重点聚焦于降低直接税税率、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三类政策,并主要从以下机制阐释其如何影响价格水平。

(一)通过调节总需求影响价格水平

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改变社会总需求规模,引发价格水平变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减税还是增加财政开支,均能通过不同渠道提升国民经济中的总需求水平,并直接拉动总体价格水平回升。具体而言,不同类型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则存在差异。降低直接税税率会减少居民承担的税负,直接提高其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带动商品和服务需求增长,形成价格上行压力。而增加政府在研发与科技服务、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支出则直接增加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推动总需求的扩张和价格水平的上升。

(二)通过调整需求结构影响行业价格水平

财政政策对各产业需求的调节并不是均匀的,因此对不同行业的价格水平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第一,降低直接税税率带来的需求结构偏向消费品与生活性服务部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后,对食品、家电、餐饮、文旅等消费品和生活性服务的需求弹性更高,这类部门的需求将率先增长,直接推动其价格水平提升。随后通过产业关联效应间接拉动上下游其他部门的需求增长和价格上升。第二,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带来的需求结构偏向研发密集型产业。政府对研发与科技服务的直接投入,会优先扩大对高新技术设备、科研服务、高端人才等要素的需求,推动研发密集型产业的价格水平快速上升,再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投入产出关联,逐步将需求拉动效应传导至其他产业。第三,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的需求结构集中于公共服务部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直接被政府支出拉动,这类部门的服务价格将率先上涨,进而通过产业关联带动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和价格增长。

(三)通过调节总供给影响价格水平

尽管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于需求侧,但其对供给侧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尽管这种影响效果在短期内相对滞后。一方面,政府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通过促进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系统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长期供给能力,进而从供给端抑制价格水平过快上涨(Romer, 1990)。同时,政府对基础设施的配套投资,

能够降低企业生产与交易成本,进一步缓解物价上涨压力。另一方面,政府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直接推动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的价格上升,进而提高居民生活成本,间接推高劳动力工资水平,而工资上涨会通过成本传导效应带动整体价格水平上升(Baumol, 1967; Hubbard 等, 1995)。尽管财政政策通过供给侧对价格水平具有长期调节作用,但其效果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本文聚焦于短期政策效应分析,因此主要着眼于将需求侧作用机制纳入模型进行模拟分析。

四、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影响的 CGE 理论模型构建

(一)本文 CGE 模型

1. 生产部门。假定经济中共有 i 或 j 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的生产过程采用两层嵌套结构:第一层中,资本与劳动以 Cobb-Douglas 函数合成为复合要素;第二层中,复合要素与中间投入品以 Leontief 函数共同生产部门总产出。

(1)要素层生产函数与要素需求。部门 i 的复合要素 Y_i 由资本 K_i 与劳动 L_i 通过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得到:

$$Y_i = A_i K_i^{\alpha_i} L_i^{1-\alpha_i} \quad (1)$$

其中, A_i 为部门 i 的技术效率参数, α_i 为资本份额, $1-\alpha_i$ 为劳动份额。记资本价格(资本报酬率)为 r , 工资率为 W , 复合要素价格为 P_i^Y 。在完全竞争假设下,企业通过利润最大化决定要素使用量,其利润函数为:

$$\Pi_i = P_i^Y Y_i - rK_i - WL_i \quad (2)$$

对 K_i, L_i 分别求解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得:

$$K_i = \alpha_i \frac{P_i^Y}{r} Y_i \quad (3)$$

$$L_i = (1 - \alpha_i) \frac{P_i^Y}{W} Y_i \quad (4)$$

式(3)-(4)刻画了部门 i 在给定价格体系下的要素使用行为。

(2)中间投入与总产出。部门 i 的总产出记为 Z_i , 由复合要素投入和中间品投入按固定比例共同决定。设 X_{ji} 为部门 i 对部门 j 产品的中间投入需求, b_{α} 为复合要素在产出中的 Leontief 系数, b_{ji} 为中间品在产出中的投入系数,则 Leontief 生产结构可写为:

$$Z_i = \min \left\{ \frac{Y_i}{b_{0i}}, \frac{X_{1i}}{b_{1i}}, \dots, \frac{X_{ni}}{b_{ni}} \right\} \quad (5)$$

在均衡状态下,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为:

$$Y_i = b_{\alpha} Z_i \quad (6)$$

$$X_{ji} = b_{ji} Z_i \quad (7)$$

记 P_i^Z 为部门 i 的产出价格, P_j^O 为商品 j 的合成品价格,则在完全竞争和零利润假设下,部门 i 的零利润条件为:

$$P_i^Z Z_i = P_i^Y Y_i + \sum_j P_j^Q X_{ji} \quad (8)$$

式(1)-(8)共同给出了本文 CGE 模型中生产模块的完整刻画。

2.国际贸易。模型采用小国假设,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为价格接受者,外币计价的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分别为 P_i^M 和 P_i^{Ef} ,通过名义汇率 ER 转换为本币计价的进口价格 P_i^M 和出口价格 P_i^E :

$$P_i^M = ER \times P_i^{Mf} \quad (9)$$

$$P_i^E = ER \times P_i^{Ef} \quad (10)$$

外贸部门需满足外汇收支平衡条件,即出口品 E_i 的收入与进口品 M_i 的支出之差等于外生给定的外国储蓄 FS :

$$\sum_i P_i^E E_i - \sum_i P_i^M M_i = FS \quad (11)$$

(1)Armington 进口-国内产品替代。假定国内使用的商品 Q_i 为国产品 D_i 与进口品 M_i 的 CES 合成品。设 δ_i 为进口品的份额参数, σ_i 为替代弹性,则 Armington 函数为:

$$Q_i = \left[\delta_i M_i^{\frac{\sigma_i-1}{\sigma_i}} + (1-\delta_i) D_i^{\frac{\sigma_i-1}{\sigma_i}} \right]^{\frac{\sigma_i}{\sigma_i-1}} \quad (12)$$

在 CES 结构下,给定进口产品价格 P_i^E 和国内产品价格 P_i^D 情况下,由成本最小化导出进口品和国内产品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M_i = \delta_i \left(\frac{P_i^Q}{P_i^M} \right)^{\sigma_i} Q_i \quad (13)$$

$$D_i = (1-\delta_i) \left(\frac{P_i^Q}{P_i^D} \right)^{\sigma_i} Q_i \quad (14)$$

(2)CET 出口-国内供给转换。本文采用 CET 函数刻画部门的总产出 Z_i 在出口 E_i 与国内销售品 D_i 之间的转换关系,参数 γ_i 表示出口品的份额系数, φ_i 为出口品与国内销售品之间的转换弹性,则有:

$$Z_i = \left[\gamma_i E_i^{\frac{\varphi_i+1}{\varphi_i}} + (1-\gamma_i) D_i^{\frac{\varphi_i+1}{\varphi_i}} \right]^{\frac{\varphi_i}{\varphi_i+1}} \quad (15)$$

生产者的最优化问题为,在给定出口价格 P_i^E 与国内出厂价格 P_i^D 的条件下,通过收益最大化将产品在出口与国内销售之间进行配置,得到的出口品与国内销售品的供给函数分别为:

$$E_i = \gamma_i \left(\frac{P_i^E}{P_i^Z} \right)^{\varphi_i} Z_i \quad (16)$$

$$D_i = (1-\gamma_i) \left(\frac{P_i^D}{P_i^Z} \right)^{\varphi_i} Z_i \quad (17)$$

3.政府收支。政府部门的收入主要来自对居民征收的直接税以及对企业以价内税形式征收的生产

税。记居民税率为 t_h ,生产税率为 t_{pi} ,则居民直接税收入为:

$$T_h = t_h Y_h \quad (18)$$

其中, Y_h 为居民总收入,包括资本收益和劳动所得,可以表示为 $Y_h = W \times L + r \times K$ 。其中, L 和 K 分别表示经济中的劳动与资本的总规模。

企业生产税收入为:

$$T_p = \sum_i t_{pi} P_i^Z Z_i \quad (19)$$

政府预算约束为:

$$T_h + T_p = \sum_i P_i^Q G_i + SG \quad (20)$$

其中, G_i 为政府对商品 i 的消费, SG 为政府储蓄。进一步假定政府各类商品上的消费遵循固定消费结构,即:

$$P_i^Q G_i = \mu_i \times G \quad (21)$$

其中, G 为政府总消费规模, $G = \sum_i P_i^Q G_i$, μ_i 为政府对商品 i 的消费倾向,且 $\sum_i \mu_i = 1$ 。

4.投资需求。本文设定投资所需资金来自各部门储蓄形成的社会总储蓄。社会总储蓄 S 由居民储蓄 Sh 、政府储蓄 SG 以及外国储蓄 FS 构成:

$$S = Sh + SG + FS \quad (22)$$

对每一类复合商品 i 形成的投资需求 I_i 为总投资或者说总储蓄的固定份额 λ_i ,满足:

$$I_i = \lambda_i S \quad (23)$$

其中, $\sum_i \lambda_i = 1$ 。模型假定居民与政府储蓄均为其收入的固定比例,即:

$$S_h = s_h Y_h \quad (24)$$

$$SG = s_g Y_g \quad (25)$$

其中, s_h, s_g 分别为居民和政府的储蓄倾向, Y_g 为政府总收入。

5.居民消费。居民的消费行为由以下效用最大化行为所描述,其中居民的效用函数为对各类消费品的 CES 加总:

$$\max U = \left(\sum_{i=1}^n \beta_i C_i^\rho \right)^{\frac{1}{\rho}} \quad (26)$$

居民的预算约束如下:

$$\sum_{i=1}^n P_i^Q C_i = Y_h - S_h - T_h \quad (27)$$

其中, U 为居民的总效用, C_i 为居民对商品 i 的消费量, β_i 为效用函数中的权重系数, ρ 为替代弹性,表示商品之间的替代程度。

根据一阶条件,可以解出每个商品 i 的消费需求函数:

$$C_i = \beta_i \left(\frac{Y_h - S_h - T_h}{P_i^Q} \right)^\rho \quad (28)$$

6. 市场出清。具体来说：

(1) 商品市场出清。对于每一种商品 i ，其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总供给由国内产出和进口构成，总需求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需求和出口，商品市场出清条件为：

$$Z_i + M_i = C_i + G_i + I_i + E_i \quad (29)$$

(2) 要素市场出清。要素市场上的各产业的资本需求的加总等于资本要素禀赋的总规模：

$$\sum_i K_i = \bar{K} \quad (30)$$

7. 模型闭合。本文模型在传统的新古典闭合方式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一方面，社会总投资与政府总消费设为外生变量，从而反映有效需求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相应的设定政府储蓄率内生调整以满足政府预算平衡；另一方面，将要素市场上的劳动要素供给设为内生，从而反映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就业压力，同时将工资作为价格基准。

(二) 数据和参数

在数据方面，本文利用 2020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编制了包含 13 个生产部门的社会核算矩阵，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数据基础。在模型参数方面，参考细江敦弘等 (2014)，本文将模型中 CES 函数和 CET 函数的弹性系数 η 和 φ 分别设置为 0.5 和 1.5，其他参数基于编制的社会核算矩阵，通过校准方法得到。

五、模拟情景设计及模拟结果

(一) 政策情景设计

近年来，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发挥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为有效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新冠疫情冲击等风险挑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①。本文针对性地设计以下三类模拟情景以讨论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特别是价格水平的影响效果。

情景一：扩大国内总需求。当前，扩大内需已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居民收入以大力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本文由此设置情景一，设定直接税税率分别降低 4%、6%、8%，模拟旨在扩大国内总需求的财政政策的效果。

情景二：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强化科技投入，不仅有助于强化对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推动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能引导要素资源向技术密集型和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集聚，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本文由此设置情景二，设定政府对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分别增加 5%、10%、15%，模拟旨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财政政策的效果。

情景三：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财政政策民生导向，是财政职责所在、使命所在。通过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重点支持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可以推动公共服务体系更趋健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本文由此设置情景三，设定政府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 5%、10%、15%，模拟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

(二) 模拟结果分析

1. 降低直接税税率的模拟结果分析。本文分析降低直接税率对宏观经济特别是价格体系的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降低直接税率首先增加了居民收入，提高了经济中的总需求，然后拉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因此，下文首先分析降低直接税率对需求端的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然后再分析其对生产端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1) 降低直接税税率对需求端变量的影响。降低直接税率对需求端经济变量的影响如表 1 所示。从模拟结果来看，降低直接税率提高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促进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了经济总需求的提升。

第一，降低直接税率促进了以需求法实际 GDP 衡量的实际总需求以及需求端价格水平上升，且价格水平上升幅度大于实际总需求。具体而言，当直接税税率降低幅度分别为 4%、6% 和 8% 时，实际总需求上涨幅度分别为 0.08%、0.12%、0.16%，需求端价格水平上升幅度分别为 0.09%、0.13%、0.17%。

表 1 降低直接税率对需求端变量的影响 (%)

类别	直接税降低 4%	直接税降低 6%	直接税降低 8%
实际总需求	0.08	0.12	0.16
需求端价格	0.09	0.13	0.17
总消费	0.17	0.25	0.33
居民消费	0.24	0.36	0.48
政府消费	0.00	0.00	0.00
总投资	0.00	0.00	0.00
净出口	0.00	0.00	0.00
进口	0.08	0.12	0.16
出口	0.07	0.10	0.14

第二，降低直接税会推升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降低直接税直接提升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由此拉动经济规模扩张并进一步带动消费以及进口、出口等其他经济变量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居民消费的增长幅度高于进口、出口等变量的增长幅度。具体而言，当直接税率降低幅度分别为 4%、6% 和 8% 时，居民消费增长幅度分别为 0.24%、0.36%、0.48%，远高于增长幅度分别为 0.08%、0.12%、

^①资料来源：蓝佛安.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R]. 北京：《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2025.

0.16%的进口，以及增长幅度分别为 0.07%、0.10%、0.14%的出口。而且政府消费与投资外生给定，进口、出口变动幅度大致相等而相互抵消，导致除居民消费以外的政府消费、投资、净出口的部分几乎没有变动，使得最终需求结构向居民消费倾斜。

(2)降低直接税税率对生产端变量的影响。降低直接税率对生产端经济变量的影响如表 2 所示。从模拟结果来看，第一，如前所述，降低直接税率提高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促进了居民消费及总需求的增长，而总需求的扩张进一步拉动了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提升。具体而言，当直接税率降低幅度分别为 4%、6%和 8%时，总产出增长幅度分别为 0.08%、0.12%和 0.16%，生产端价格水平上升幅度分别为 0.09%、0.13%和 0.17%。

第二，由于居民消费对于各产业产品的需求程度以及这些消费品对各产业的拉动程度不同，因而各产业的产出及生产价格的提升程度是有差异的。总体而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高，而农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低。在第二产业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重工业、采矿业、机械工业的价格上升幅度相对较高，而轻工业、建筑业的价格上升幅度相对较低。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输邮电业的价格上升幅度相对较高，而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研发与科技服务业价格上升幅度相对较低。

表 2 直接税率降低对生产端变量的影响 (%)

类别	直接税降低	直接税降低	直接税降低
	4%	6%	8%
总产出	0.08	0.12	0.16
生产端价格	0.09	0.13	0.17
各行业生产价格			
农业	0.03	0.05	0.06
采矿业	0.10	0.14	0.19
轻工业	0.10	0.11	0.15
重工业	0.12	0.15	0.20
机械工业	0.10	0.14	0.1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12	0.16	0.21
建筑业	0.04	0.12	0.16
商贸流通业	0.07	0.12	0.16
运输邮电业	0.09	0.14	0.18
信息技术服务业	0.10	0.14	0.19
金融业	0.11	0.16	0.21
研发与科技服务业	0.06	0.12	0.16
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	0.04	0.09	0.12

2.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的模拟结果分析。本文分析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对宏观经济特别是价格体系的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直接提升了宏观经济中的总需求，然后拉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因此下文首先分析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对需求端的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然

后再分析其对生产端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1)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对需求端变量的影响。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对需求端经济变量的影响如表 3 所示。

表 3 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对需求端变量的影响 (%)

类别	研发与科技服务	研发与科技服务	研发与科技服务
	支出增加 5%	支出增加 10%	支出增加 15%
实际总需求	0.11	0.22	0.33
需求端价格	0.11	0.21	0.32
总消费	0.21	0.42	0.63
居民消费	0.11	0.23	0.34
政府消费	0.42	0.84	1.26
总投资	0.00	0.00	0.00
净出口	0.00	0.00	0.00
进口	0.10	0.22	0.32
出口	0.09	0.19	0.28

从模拟结果来看，在短期内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景下，财政支出增加了对研发与科技服务的消费，提升了对该行业的需求，并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相互作用带动总需求的增长。

第一，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促进了以需求法实际 GDP 衡量的实际总需求以及需求端价格水平的上涨，且价格水平上涨幅度小于实际总需求，与降低直接税率的情景相反。具体而言，当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加幅度分别为 5%、10%和 15%时，实际总需求增长幅度分别为 0.11%、0.22%、0.33%，需求端价格水平上涨幅度分别为 0.11%、0.21%、0.32%。

第二，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会推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直接提升了政府消费规模及经济总需求，由此拉动经济规模扩张并进一步带动居民消费以及进口、出口等其他经济变量增长。其中，政府消费的增长幅度最高，接下来是居民消费及进口，出口的增长幅度最低。但是，由于进口与出口上涨的总体规模相差不大而相互抵消，因此净出口几乎没有变动。具体而言，当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长幅度分别为 5%、10%和 15%时，增长幅度最高的政府消费分别提升为 0.42%、0.84%、1.26%，增长幅度居于其次的居民消费分别提升为 0.11%、0.23%、0.34%，接下来进口的增长幅度分别为 0.10%、0.22%、0.32%，增长幅度最低的出口分别提升 0.09%、0.19%、0.28%。

(2)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对生产端变量的影响。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对生产端经济变量的影响如表 4 所示。从模拟结果来看，第一，如前所述，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提高了对该产业的需求，并通过各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提升了对其他产业的需求，而总需求的扩张进一步拉动了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提升。具体而言，当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长幅度分别为 5%、10%和 15%时，总产出提

升幅度分别为 0.11%、0.22%和 0.33%，生产端价格水平上涨幅度分别为 0.11%、0.21%和 0.32%。

表 4 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对生产端变量的影响 (%)

类别	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加 5%	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加 10%	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加 15%
总产出	0.11	0.22	0.33
生产端价格	0.11	0.21	0.32
各行业生产价格			
农业	0.04	0.08	0.12
采矿业	0.12	0.24	0.36
轻工业	0.09	0.18	0.27
重工业	0.12	0.25	0.37
机械工业	0.12	0.24	0.3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13	0.26	0.39
建筑业	0.10	0.20	0.31
商贸流通业	0.10	0.20	0.30
运输邮电业	0.12	0.23	0.35
信息技术服务业	0.12	0.24	0.36
金融业	0.13	0.26	0.39
研发与科技服务业	0.10	0.20	0.29
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	0.08	0.15	0.23

第二,由于研发与科技服务业对各产业需求的拉动程度不同,以及各产业的供给需求特征不同,导致各产业的产出及生产价格的提升程度是有差异的。总体而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高,而农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低。在第二产业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重工业、采矿业、机械工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高,而轻工业、建筑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低。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输邮电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高,而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研发与科技服务业、商贸流通业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是对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展开模拟,且该行业需求提升最高,但影响主要体现在产出增加上,其价格上涨幅度并不算高。

3.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的模拟结果分析。本文分析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对宏观经济特别是价格体系的影响。与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的情景类似,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同样直接提升了宏观经济中的总需求,然后拉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因此下文首先分析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对需求端的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然后再分析其对生产端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1)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对需求端变量的影响。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对需求端经济变量的影响如表 5 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的情景和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类似,在提升该行业的需求的同时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

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相互作用带动了总需求的增长。

一方面,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促进了以需求法实际 GDP 衡量的实际总需求以及需求端价格水平上涨,且价格水平上涨幅度小于实际总需求。具体而言,当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幅度分别为 5%、10%和 15%时,实际总需求上涨幅度分别为 0.97%、1.94%、2.90%,需求端价格水平上涨幅度分别为 0.95%、1.89%、2.82%。

另一方面,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同样推升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作用机制和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的机制类似。具体而言,当公共事业与居民服务支出上涨幅度分别为 5%、10%和 15%时,上涨幅度最高的政府消费分别提升为 4.21%、8.41%、12.61%,上涨幅度居于其次的居民消费分别提升为 1.18%、2.36%、3.54%,接下来进口的上涨幅度分别为 0.74%、1.48%、2.22%,上涨幅度最低的出口分别提升 0.64%、1.28%、1.93%。

表 5 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对需求端变量的影响 (%)

类别	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 5%	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 10%	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 15%
实际总需求	0.97	1.94	2.90
需求端价格	0.95	1.89	2.82
总消费	2.13	4.25	6.37
居民消费	1.18	2.36	3.54
政府消费	4.21	8.41	12.61
总投资	0.00	0.00	0.00
净出口	0.00	0.00	0.00
进口	0.74	1.48	2.22
出口	0.64	1.28	1.93

(2)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对生产端变量的影响。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对生产端经济变量的影响如表 6 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可以得到以下两方面结论:

第一,与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的情景类似,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提高了对该产业的需求,并通过各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提升了对其他产业的需求,而总需求的扩张进一步拉动了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提升。具体而言,当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幅度分别为 5%、10%和 15%时,总产出上涨幅度分别为 0.97%、1.94%和 2.91%,生产端价格水平上涨幅度分别为 0.94%、1.88%和 2.81%。

第二,各产业供给需求特征以及与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关系不同,导致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拉动各产业的产出及生产价格的程度存在差异。总体而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高,而农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低。在第二产业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重工业、采矿业、机械工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高,而轻工业、

表 6 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对生产端变量的影响(%)

类别	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 5%	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 10%	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增加 15%
总产出	0.97	1.94	2.91
生产端价格	0.94	1.88	2.81
各行业生产价格			
农业	0.34	0.68	1.02
采矿业	1.06	2.12	3.17
轻工业	0.81	1.61	2.42
重工业	1.10	2.19	3.29
机械工业	1.06	2.11	3.1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16	2.32	3.48
建筑业	0.90	1.80	2.70
商贸流通业	0.88	1.76	2.63
运输邮电业	1.02	2.03	3.05
信息技术服务业	1.05	2.10	3.15
金融业	1.14	2.29	3.43
研发与科技服务业	0.87	1.73	2.59
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	0.67	1.34	2.00

建筑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低。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输邮电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高,而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研发与科技服务业、商贸流通业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低。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业本身的价格上升幅度并非最高,对其需求提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出增加上。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建立了包含多种类型财政政策特征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降低直接税税率、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增加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价格体系的影响效果及机制进行模拟分析。本文研究的模拟结果表明:首先,三类扩张性财政政策都提升了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价格水平的提升。相比较而言,降低直接税税率对价格的提升作用大于对产出的提升作用,而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两种财政政策对价格的提升作用小于对产出的提升作用。其次,三类扩张性财政政策都促进了需求结构向消费倾斜。最后,三类财政政策对各产业价格水平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总体而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高,而农业的价格上升幅度较低。在第二产业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重工业、采矿业、机械工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高,而轻工业、建筑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低。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输邮电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较高,而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研发与科技服务业价格上升幅度相对较低。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调控作用。模

拟结果表明:降低直接税税率、增加研发与科技服务支出、扩大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支出等三类扩张性财政政策,均能有效提升总需求并带动价格水平回升。在当前价格水平低位运行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下,应适时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价格向合理区间回归,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首先,精准实施减税政策,进一步扩大减税政策的覆盖范围,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增加育儿、养老、职业教育等方面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推动价格水平合理回升。其次,加大对研发与科技服务的财政投入,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基础再造,提升产业链韧性 with 附加值,带动中上游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价格合理回升。最后,稳步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提升居民长期预期与消费信心,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带动相关服务行业价格温和上涨。

2.加强财政政策在“稳价格”与“促转型”方面的协同性。财政政策不仅应着眼于短期需求刺激,还应服务于中长期结构优化目标。第一,财政政策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应注重引导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消费券等形式鼓励居民购买绿色、智能产品,推动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在稳价格的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强化财政政策的区域协调功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弥补地方疫情后财政缺口,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偿还拖欠企业账款,从而稳定就业与消费能力。

3.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兼顾稳物价与防风险。对价格水平的精准调控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协同。一方面,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应保持适度宽松,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增加市场流动性,合理引导实际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个人贷款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潜力,为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财政部门与货币当局的沟通协调,通过定期召开政策协调会议、共享经济数据和信息等方式,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形成政策合力,确保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目标设定、政策实施和效果评估等方面的有效衔接,共同推动价格水平合理回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4.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防控。在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一方面,规范赤字安排和债务发行行为,通过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加强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等措施,确保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避免因债务过快扩张引发通胀预期失控或财政金融风险累积;另一方面,加大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力度,确保财政资金真正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关键领域。同时,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评估体系,对财政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和分析,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措施,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参考文献:

[1]董秀良,帅雯君.中国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3,30(3):43-50.
 [2]胡宗义,刘亦文.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动态效应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26(2):31-35.
 [3]王振霞,张昊.非预期冲击、财政政策调控与价格总水平稳定[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4):19-25.
 [4]樊勇,姜辛.增值税的价格效应[J].财政研究,2020(9):105-118.
 [5]付一婷,吴超,周欣等.“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机制研究——基于非线性DSGE模型的分析[J].南方经济,2025(9):64-88.
 [6]细江敦弘,长泽建二,桥本秀夫.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导论:模型构建与政策模拟[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7]Fisher, Irving.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M].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8]Friedman M.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8, 58(1): 1-17.
 [9]Sargent T J, Wallace N.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 [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981, 5(3): 1-17.

[10]Leeper E. M. Equilibria under Active and Passiv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1, 27(1): 129-147.
 [11]Sims C. A simple model for stud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rice level and the interaction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J]. Economic Theory, 1994, 4(3): 381-399.
 [12]Cochrane J. H. Long-term debt and optimal policy in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J]. Econometrica, 2001, 69(1): 69-116.
 [13]Blanchard O. Public debt and low interest r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4): 1197-1229.
 [14]Kaplan G, Nikolakoudis G, Violante G L. Price level and inflation dynamics in heterogeneous agent economies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15]Kwicklis N. Active vs. passive policy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output and inflation in HANK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5, 151: 103732.
 [16]Sargent T J. 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ations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7]Reinhart C M, Rogoff K S.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2): 573-578.
 [18]Alesina A, Perotti R. Fiscal expansions and adjustments in OECD countries [J]. Economic Policy, 1995, 10(21): 205-248.
 [19]Bianchi F, Ilut C. Monetary/fiscal policy mix and agents' beliefs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7, 26: 113-139.
 [20]Cochrane J. H. A fiscal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with partially-repaid long-term debt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22, 45: 1-21.
 [21]Cevik S, Miryugin F. It's never different: Fiscal policy shocks and inflation [J].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24, 66: 1-28.
 [22]Barro R J, Bianchi F. Fiscal Influences on Inflation in OECD Countries, 2020-2023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23]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S71-S102.
 [24]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25]Hubbard R G, Skinner J, Zeldes S P.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Social Insuranc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2): 360-399.

(作者单位:程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徐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on Price Levels: A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GE Model

CHENG Yuan^{1,2} and XU Jie¹

(1.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2.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ersistently low price levels in China,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ies in influencing price dynamics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various fiscal policy measures to simulat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expansionary policies—specifically, reductions in direct tax rate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and enhanced public and household services spending—o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both overall and sector-specific price level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stly, all three fiscal measures contribute to an increase in aggregate demand, thereby driving a rise in the general price level. Secondly, these fiscal policies tend to shift demand toward consumption. Finally, the impact on price levels varies across sectors, with the price increases being most pronounced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while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experiences a relatively smaller rise in prices. The findings offer valuabl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fiscal policy tools and enhanc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in achieving a moderate recovery in price levels.

Keywords: fiscal policy; price levels;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